

忍辱、逃离与流浪：论《微物之神》的女性创伤书写

钱娟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运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来解读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获奖作品《微物之神》,剖析了小说中三代女性所遭遇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将宗教、阶级、性别和创伤主题有机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不仅仅是个别女性,更代表印度女性的整体创伤记忆,同时也表达了印度广大女性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期待改变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微物之神》;阿兰达蒂·洛伊;女性创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2-0075-04

《微物之神》是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以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为背景而创作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并以多种方式讲述故事的小说”^[1],小说以女性和孩童的视角入手,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围绕主人公阿慕和维鲁沙“越界”的爱情以及阿慕的儿女——双胞胎兄妹艾斯沙、瑞海尔的成长经历,讲述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小镇阿耶门连一个家族的悲伤故事。这本书于1997年获得了全美图书奖、英国布克奖,西方评论界说这本书“充满了神奇、神秘和哀伤,使人看到最后一页时,会想要再重头看一遍。于是完美的故事又再度萦绕心头”。阿兰达蒂·洛伊,印度女作家,16岁时离家,只身来到新德里,在学校主修建筑,毕业后做过记者、编辑,后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这些为她的第一本成名作《微物之神》奠定了坚实的文字基础,《纽约客》曾评价到“洛伊以优美动人的笔触,一层层揭开作品的神秘面纱;她对故事的灵巧闪避,令人目眩,讨论情节对她将是一种冒犯”。

英文小说《微物之神》被认为是印裔英语作家苏珊娜·阿兰达蒂·洛伊迄今为止非常成功一部作品。该小说出版于印度独立50周年之际,创下上市半小时内销售27000册的销售记录,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29个国家发行,目前全球

总发行量已逾600万册,国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已然成为一个热点。纳伦德拉·蒂瓦里(Narendra Tiwari)从作家的身世、性格、经历入手,深度地研究小说《微物之神》和洛伊本人、当代印度之间的联系,认为小说既折射了洛伊的现实生活,也隐射了当代印度社会中的一些尖锐问题,表达了对印度弱势群体和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关注。

一、创伤理论和女性创伤

创伤批评理论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目前已经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扩展到社会学、艺术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纵观国内外众多的创伤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三个方面的社会现象:一是战争、非人性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创伤;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三是弱势种族、群体在殖民历史和全球化进程中所遭受到的精神创伤。在小说家的创伤基调下,“创伤小说不仅成为表达精神重压的方式,也是作家对创伤记忆进行掌握和控制的方式,它与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相互交叠,并从中多有借鉴。”^[2]

在梳理欧美创伤理论研究时,师彦灵指出,“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小说、自传等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要历史时刻、历史地点等为切入点,

收稿日期:2019-03-02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18A0646)。

作者简介:钱娟(1980—),女,安徽合肥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教法。

在虚构和非虚构、编造和再造之中,以少数族裔女性的创伤叙事,创造了一种对抗记忆……她们的创伤叙事文本揭示出存在于主流话语边缘或缝隙之中的少数族裔女性充满创伤的历史。”^[3]正因如此,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将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与创伤投射到《微物之神》的创作中,出生的阶级、性别、父母、家庭以及童年时期遭受的冷遇,不仅成为洛伊郁结于心的痛苦回忆,也为该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素材。

二、印度古老家族三代女性的创伤记忆

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通过异卵双胞胎中的女性瑞海儿的视角来审视后殖民时期下日渐疏离的亲情关系、矛盾重重的家庭氛围,以及独立后的印度社会现实,从而揭开了印度正教望族的家族衰落史,以及其中三代女性遭受的深深创伤。

1. 忍辱偷生的帮凶者

作为阿耶门连“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女性,玛玛奇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身心的创伤和痛楚。而这些创伤主要源自她的婚姻,并影响了她的一生以及子女。

在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印度婚姻制度的发展是比较独特的,它随着印度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演化,先后经历了从古代的种姓婚姻到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婚姻,即使经过近代英国统治下的婚姻变革,独立后的婚姻制度还保留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强烈的男尊女卑思想。《摩奴法典》是集宗教性和法律性为一体的古印度婆罗门教义性的法典,成功地“使古印度由原始的“习俗婚”向文明的法律化婚姻制度转化,这种转化在整个古印度社会各个阶层发生作用,使原本针对婆罗门阶级的婚姻法典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其中,在规定婚姻中权利与义务时,男方比女有着更广泛的权利和更少的义务,“首先有选择妻子的权利,要求对方漂亮、聪明、无缺陷。其次有支配妻子的权利,有休弃妻子的权利”。^[4]。作为一位曾是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的帕帕奇,“向来是一个善于嫉妒的人”,尤其“非常憎恶他的妻子突然获得注意力”,年轻时在维也纳求学期间,偶尔得知妻子“具有不寻常的天赋,有成为演奏家的潜能”时,充斥着“男权”思想的帕帕奇立即中断了妻子的小提琴课程,继而用传统婚姻法律来压迫玛玛奇长期从事家务劳作,稍有不满意“脾气暴烈”的帕帕奇就会拿一只黄铜花瓶殴打

她,还会发泄似的弄断玛玛奇的小提琴琴弓,并将它丢到河里,在许多年的婚姻生活里,玛玛奇是“心怀怨恨、长期受苦”的。退休后的帕帕奇整天无所事事,对比之下玛玛奇却因为拿手的腌果菜和果酱而感到十分兴奋,为了应付那些蜂拥而至的订单而忙得不可开交,对此,帕帕奇感到“十分震惊”,退休后寂寞无人赏识的日子和他的妻子欢愉而忙碌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郁郁寡欢”,而且“折磨着他的孩子,以及他孩子的孩子”。婚姻里的痛楚与殴打已让玛玛奇从“心怀怨恨”到慢慢“习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儿子恰克,“他变成她所有情感的贮藏所,变成她的男人,她唯一的爱”。她“私自当了她的珠宝,把钱寄到英国”给安于享乐的恰克,她“明白他和工厂女人的放荡关系”,并将这理解为“男人的需要”。而对于“同病相怜”的女儿却没有给予相应关爱和照顾,长期忽略、“没有注意”,对女儿结婚的请求采取了“没有回信”的状态,甚至对阿慕和“贱民”维鲁沙的“越界”,“她的恼怒变成了一种对她女儿以及她所做之事的冷酷蔑视”,她没有半点怜悯、同情和理解,她愤怒地将阿慕锁起来,又把她赶出家门,使得无依无靠的阿慕在孤独和恐惧中死去,而自己也在丈夫去世后,孤苦寂寞地度过了最后的生命。

2. 逃离又回归者

印度,一个充满强烈男权色彩的国家。印度的“大神”统治着这个社会成百上千年,带来的是阶级固化和男权思想。出生低贱的人们在种姓制度下几乎被剥夺一切——爱的权利甚至生命的权利,而女性更是在“神权”“阶级”“父权”等压迫下失去自我。

大神制定律法,规定等级,控制最不应被控制的情绪——爱,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印度女性从小就被教育成男人的附属品,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小说中,第二代女性代表阿慕和哥哥恰克,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家庭,作为男性的恰克,无论“他做出过分古怪、反常的行为”,都会得到家人的“允许”和庇护,并理解为“男人的需要”。而作为女儿的阿慕,一直生活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或者至少在她的父母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在成长中长期遭受“邪恶的狡猾的”父亲的殴打和母亲的冷漠,原生家庭让阿慕学会了“和冷静、有计划的残酷共存”,滋生了“一种顽固而鲁莽的癖性”。阿慕

中学毕业后,父亲帕帕奇坚持认为“让一个女孩上大学是一项不必要的开销”^{[3]34},因此年轻的阿慕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家里帮忙干活,等人上门来提亲。“策划了几个笨拙的小计谋”后,她成功地逃离了“她那脾气暴烈的父亲以及心怀怨恨、长期受苦的母亲掌控”时,她又一次发现她难逃命运的捉弄,她犯了一个错,她嫁错了人,她发现她的丈夫不只是一个豪饮者,也是一个带着所有酗酒者的偏差和悲剧魅力的十足酒鬼,并且常常陷入“酒精中毒的昏迷”,然后连续数天“躺在床上,没有去工作”。当英籍经理贪慕阿慕美色,威逼利诱时,这个“低等职员”先是“胆怯”,渐渐“鼓起勇气”卑躬屈膝请求,接着对阿慕的一顿暴力——“他冲向她,抓住她的头发,对她拳打脚踢”。不堪忍受的阿慕最终选择离开了丈夫,“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回到她几年前逃离的一切中”。原以为这婚姻可以带她逃离无爱的家庭,却最终这种“顽固而鲁莽的癖性”令她陷入另一个无爱的境地。对于长期遭受种族和性别不公对待、家庭忽视冷漠的阿慕,生活或许就应该是一个没有出路的环形,逃离之后又是回归。

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度就确立了种姓制度,把人们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阶层,并且规定各种族之间不允许通婚。阿慕,一个高阶级的离婚女人,是曾被“安提阿主教亲自祝福的小孩”,有一个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的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哥哥和一个创办了天堂果菜研制厂的母亲,而维鲁沙则是一个处于贱民阶层的“帕拉凡”,世代为阿慕家干活,两人注定不能相爱,种姓的边界不可逾越。作家罗伊打破了“大物之神”(the God of Big Things)与“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之间以及个人私事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二元对立^[4],充分表现了“越界”这一主题。离婚后,回到阿耶门连的阿慕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是“危险的”,“她内心与他战斗的东西,一种不能混合的混合——母性的无限温柔和自杀式轰炸机的鲁莽的愤怒”使她只能在贱民维鲁沙那儿寻求情感上的依靠。但是他们竟然越过了“危险的”大河,在黑夜中“历史之屋”中相聚,他们“打破了规则,闯入了禁区。”大神震怒,说维鲁沙得死,并最终被警察暴打致死,他全部的罪就是逾越。阿慕也死了,阿慕的罪不仅仅是她爱了一个贱民,还因为她没有像宝宝克加玛一样“优雅地接受命运,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的命

运”^{[5]40},“事实上,这件事开始于爱的律法被订立之时——那种规定谁应该被爱,和如何被爱的法律。”^{[5]30}

无论是家庭、婚姻还是命运,阿慕都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表象上是亲人的冷漠虐待导致其悲惨地客死他乡,实则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和种族制度戕害了阿慕,让她在家庭、婚姻和命运上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避免争吵和对抗,“终生受到大人物恐吓”,而这些造成了她短暂而又悲伤的一生。

3. 精神流浪者

瑞海儿,作为这个满目疮痍家族的第三代女性,从小像阿慕一样饱受长年“酗酒”父亲的“暴力”,跟随离了婚的母亲回到“不受欢迎”的阿耶门连。“阿慕爱她的孩子,但是他们那种带着天真的脆弱,以及愿意爱那些并不真正爱他们的人的倾向,使她感到恼怒,使她有时想要伤害他们”。玛玛奇还是对她们继续的“不注意”,舅舅恰克也对她们“不负责任”,甚至是一辈子未出嫁的老姑婆——宝宝克加玛也“不喜欢”她们,认为她们是“半个印度教,是杂种”,“没有父亲的流浪儿”。家庭的不完整,亲情和爱的缺失使得“瑞海儿是在没人引导的情况下长大,没有人为她安排婚姻,没有人为她办嫁妆”,从儿童时期(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再到另一所学校)进入成人时期,她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和“保持安静”。中学时期“她被开除过三次”,中学毕业后,她得到一所普通建筑学院的入学许可,“这并不是因为她对建筑有任何真正的兴趣”,只是“碰巧参加入学考试,碰巧通过这项考试罢了”。成年后,瑞海儿居无定所,在“纽约一家印度餐厅当女侍”,“华盛顿外一家加油站的防弹室里当夜间职员”……婚姻里,瑞海儿漫不经心地走进,就像“机场候机室的一名旅客走向一张没有人坐的椅子”。瑞海儿骨子里这种“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不甚要紧”使得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后来的丈夫也“变得无所谓,变得真正的冷漠”。

瑞海儿和哥哥艾斯沙是异卵双胞胎,曾经艾斯沙和瑞海儿认为“在一起时,他们是‘我’;分开时,他们是‘我们’。仿佛他们是一对暹罗双胞胎,身体分开,但本性却相连”,而阿慕和维鲁沙的“越界”使“生存的代价爬到了一个他们负担不起的高度”,丧失了“两条生命,两个孩子的童年”。表姐苏菲默尔在双胞胎带领下,深夜在“暗

黑之河”划船溺亡后,瑞海儿和艾斯沙因为惩罚而被强制分开,艾斯沙被迫送回到他父亲那儿,瑞海儿也因为母亲再次被赶出家门后生活凄苦,不停地流浪。曾经亲密的,一起承担苦难又相互依靠的双胞胎,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被迫天各一方,各自舔舐自己因家庭、亲情沦丧带来的创伤。诚然,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让读者在感伤之余充满希望,作为双胞胎的妹妹瑞海儿和哥哥艾斯沙最终重回故里阿耶门连,彼此能够相互抚慰、扶持与帮助,以期走出创伤的愈合历程。

三、种族、殖民与全球化进程的共谋

回顾作家洛伊的童年以及成长经历,不难看出《微物之神》是洛伊个人创伤经历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它却远远超出了仅仅书写个体的情感创伤体验,它通过一个儿童天真的视角去观察印度历史的一个侧面,从而表现了印度的种姓传统、父权制度以及殖民主义给印度女性、儿童等所造成的创伤。

1998年洛伊在接受采访时说“然而这本书(《微物之神》)不是指真的发生过什么,而是事件在发生之后对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我并不认为我的小说是一部愤怒批评我们社会的小说……它是一种观察角度,呈现出我们天性中极端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我们有时爱得如此之深,然而我们爱得却如此残忍。”^[6]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体系获得独立后,种姓制度也正式被废除,然而在实际社会运作和人们的生活中,那些被认为非法的种姓分类与歧视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在长期被殖民过程中,种族主义为了政权需要经历过许多调整被固定、僵化,直接影响着政治、经济、教育及婚姻等等各个方面。小说中,三代女性——玛玛奇、阿慕以及瑞海儿,在种族意识的规训下,分别表现出对女儿嫁给了异教徒的不满,选择黑暗的深夜与贱民相爱的胆怯,感知家庭地位骤降选择流浪远方的绝望,《微物之神》揭露了种族主义以传统宗教为载体,通过家庭施加意识规训的过程。此外,《微物之神》通过描写充斥着东西方多元文化的印度南部喀拉拉为试验地,再现了种族主义与殖民强权的共谋。殖民统治也需要动用意识的规训作用,用合法化的名义来统治各阶级的意识。阿耶门连的家族借婆罗门的出身,曾祖父伊培神父的身份奠定了当地望族地位,帕帕奇担任过大英帝国的昆虫学家,后接任

新政府高管,因此退休后“即使在阿耶门连窒息的闷热天气里,他也天天穿着三件式西装,戴着金怀表”^[5]^[43],以无形的绝对家长地位经常殴打、冷漠对待开罐头厂辛勤工作的玛玛奇、无辜的女儿;而恰克,因其宗主国留学经历成为彰显家族身份的象征,父亲帕帕奇对他敬重三分,母亲玛玛奇则对他包容溺爱,甚至视一段无疾而终的跨国婚姻为骄傲。恰克控制着家里的一切——妹妹的家族财产和地位,侄子侄女的前途,无情地赶走了妹妹,驱逐了侄子和侄女,无形中导致了她们悲剧的命运,而这也鲜明地显示着父权意识在帝国扩张中隐藏的力量。《微物之神》以非线性的叙事模式,不断地交织再现了印度全球化的进程。曾经哺育生命的河流因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污染干枯,殖民时期的“历史之屋”矗立着五星级酒店,阿耶门连的房子里装置了蝶形天线,人们沉浸于“NBA篮球赛、一日赛程的板球赛以及大满贯网球赛”。在洛伊看来,这场“野蛮霸占的进程”实则是高等姓氏人种以经济发展为意识形态构建话语权,印度的民主政体在全球化口号下“冷酷高效地将资源重新分配给特权少数,卓绝保护着高薪的精英阶层,娴熟碾碎敢于违背意图的民众”^[7]。阿慕与瑞海儿的悲惨命运充分显示了这三者的共谋,缺乏政治和经济资源,成为空间争夺的牺牲品,因为“越界”,阿慕被残忍地排斥于精英区外,难获生存空间和谋生手段;瑞海儿被迫成为“全球流浪者”,精神上背井离乡,“其处境绝非是自由的表现”^[8]。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化并未实现印度政治昌明经济繁荣个人幸福的初衷,反而和种族主义、殖民制度形成了共谋,扩大了特权阶层与下层阶级之间的鸿沟,造成了其中千万中下层女性难以抚平的创伤。

四、结语

印度当代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通过细致地刻画玛玛奇、阿慕和瑞海尔祖孙三代充满创伤的经历,传承、发展了印度传统文学中的女性观念,表现了当代印度女性的生活现状和生存困境。此外,小说深度批判了宗教、种族主义对女性的规训,殖民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制,深刻表达了女性的反抗意识,也揭示了印度广大女性对创伤治愈的渴求,以及谋求出路发出的深深的探索与追问。

(下转第99页)